

“文博学术期刊的现状与前景研讨会”纪要

——纪念《故宫博物院院刊》复刊30年

陶 子

2009年11月28、29日，“文博学术期刊的现状与前景研讨会——纪念《故宫博物院院刊》复刊30年”在故宫建福宫静怡轩举行，会议由本院科研处召集，邀请了国内文物局、考古所、博物馆主办文博学术期刊的主编、编辑部负责人，以及清华大学电子杂志社负责人，与《院刊》的全体编委及本院2009年度科研奖的获奖代表，共六十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28日上午的会议由李文儒副院长主持，郑欣森院长代表故宫博物院致欢迎词。郑院长首先回顾了《院刊》的发展历程，指出《院刊》30年的发展是与博物院几代领导的辛勤关照和大家共同努力分不开的，是与我国改革开放30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院刊》30年也是我院30年工作发展的一个反映。关于今后《院刊》如何进一步发展，郑院长指出：故宫刊物的发展是与故宫博物院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故宫已经拥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专家队伍，故宫的学术研究因其藏品的特色，使它既有博物馆界、文博界的一些共同特点，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色，所以我们又把它叫故宫学派。“故宫学”能不能成为一个学派，这还是我们在探索的一个问题。如何在刊物上发扬自己的传统，同时形成一定的特色，我认为这都是需要探索的。我们需要思考的另外一点就是提高刊物的质量问题。现在社会上各种杂志有9000种，加上报纸有12000余种，就是学术界的刊物也有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既可以从中学习，获得许多有益的借鉴，又给我们提出了怎样保持自己的品位，提高办刊质量的问题。提高刊物的质量，这是任何时候都应该讲到的。要保持刊物的品味，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我们要处理好学术规范问题、文风问题和开放性问题。最后，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促进各文博期刊间的交流合作，大家共同努力、力争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张忠培先生作了《文博学术期刊的现状与前景》的讲话。他首先总结了国内文博期刊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文博期刊的发展历史以1978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以前，文博期刊有三大杂志：《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1978年以后，出现了许多新的刊物，现在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期刊，这与改革开放和考古文博事业的极大发展有关。在众多的文博期刊中，无论是稿件的学术规范、学术水平、反映问题的情况，还是学术论文的使用价值、刊物的社会反映，《考古学报》、《文

物》、《考古》这三大期刊都走在了前面，但其他期刊也各有自己的特色。

关于文博期刊今后的发展前景，他认为要办好一个期刊，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反映文博界的学术研究。编辑要做好二传手，使文博期刊成为荟集和交流文博学术成果的舞台。第二，要处理好杂志与单位的关系。文博学术期刊要办得好，就要有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广阔胸怀，而不是将他局限于反映或表达单位成果的杂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贯彻自由学术讨论精神。第三，要提高期刊的办刊质量。质量是期刊的生命线，要保证期刊的质量，就要做到学术论文有个性和特色、务实求真、论述合理。做到了这几点，刊物就会越办越好！

杨新先生就《故宫博物院院刊》的出版与发展情况作了讲话：故宫刊物是立足在故宫基础上的，解放前故宫就有了《故宫（周刊）》、《故宫（旬刊）》和《文献丛刊》，介绍故宫保存的国史档案和文物资料。可惜这几份刊物后来没有得以传承下来。1958年《故宫博物院院刊》创办，两期后停刊，1979年复刊，后来又分出了《紫禁城》杂志。《院刊》的定位是学术刊物，文风严肃；《紫禁城》定位为普及刊物，活泼一些。《院刊》复刊后引起了海外人士的注意，也得到了行内人士的重视，在国外许多著名大学的东亚部和图书馆都能看到《院刊》的身影。复刊以后的《院刊》在宣传故宫、介绍文物的同时，还担负着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培养人才的任务。这30年以来，《院刊》发表的文章在研究的深入性方面也在跟着发展，有些在学界很有影响，但其研究文章多缺乏美感。今后我们要发表更多写得好的文章，要把文物写活，让读者接受；又不能一味投其所好，还是应该保持我们文博期刊的学术性和严肃性。

张昌倬先生向《院刊》复刊30年表示了诚挚的祝贺，指出《院刊》在办刊上具有的优势。一、它背后有强大的故宫博物院作为支撑，围绕着故宫博物院的主体，写的文章都不失独家的和有特色的选择。在广度方面，故宫博物院与海内外多家大型博物馆有着广泛的联系，以此为依托，《故宫博物院院刊》一定能办成有世界影响的独特的刊物。二、它有稳定的作者群。故宫有自己的研究室和各门类的专家学者，这使得《院刊》的学术研究有了保障。除了雄厚的研究队伍和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要办好一份刊物还与领导的支持和编辑们的努力分不开。近年来在张露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院刊》办得风生水起，可以看出每一期的选题都是精心策划的，并且配合院里的重大活动组织专题专刊。《院刊》的风格是文章秀美，印刷精美，这与故宫的条件和资金支持分不开。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充分体现了故宫领导层对《院刊》的支持。有院领导的大力支持，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物资源，有故宫博物院资深专家的支持，有精干精炼的编辑人员，相信名馆出名刊，《院刊》一定会办得更有特色，更有风采，会越办越好！

下半场会议由科研处余辉处长主持，由本院的三位代表就故宫博物院刊物的发展道路理清脉络，报告最新的编辑思想。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朱赛虹女士发言的题目是《故宫博物院早期的期刊出版》。她对故宫早期刊物的历史作了梳理和回顾，认为故宫早期刊物的种类可分为两大类：资料性的刊物和研究性的刊物。资料性的刊物有《故宫（月刊）》、《故宫（旬刊）》、《故宫（书画集）》、《掌故丛编》（后改为

《文献丛编》)和《史料旬刊》。研究性的刊物有《故宫博物院年刊》、《文献特刊》、《文献专刊》和《文献论丛》，都是一些短期的刊物或是在本院周年纪念日时汇集增刊出版的。早期刊物具有以下几个特点：资料性是早期刊物的主流，刊发作品数量巨大，刊发内容门类齐全，各类资料系统连贯、名品荟萃弥足珍贵，并使得部分南迁文物得以在大陆定格。

从故宫早期刊物的成功兴办中我们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资源优势定位充分展示故宫特色；面向社会大众获得广泛认可；精心策划编排彰显刊物品位；精良印刷制作完美展现内容。

今日的故宫博物院，刊物的面貌和内容已随工作重点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变，但仍可以看出早期刊物的很多优良传统被继承下来，有些正得到恢复。希望它们不断推陈出新，长久地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院刊》执行主编张露的发言题目是：《〈故宫博物院院刊〉的发展历程和学术思考》。她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一、早期刊物为后来刊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开放后，为了更好地宣传介绍故宫，公布故宫收藏的文物和档案史料，于1929年始，先后创办了故宫月刊、周刊、旬刊、年刊等一系列的刊物，为后来两岸故宫刊物的创刊和学术导向奠定了基础。二、介绍《院刊》的创刊和复刊初期。我院于1958年创办《院刊》，1979年复刊，主要是发表古代建筑、历史、艺术的学术论文，还包括有关资料、知识为主的内容。恢复初期的院刊尚不成熟，带有较多的模仿特征和探索性特点，发稿内涵基本延续了民国时期的本院刊物内容，每期的编排不具有鲜明的编者主观因素，也很少有编辑意识很强的特色栏目。稿件70%来源于本院作者，文风朴实，以偏重史料为多。在当时对百废待兴的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三、《院刊》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随着考古工作和文博期刊的蓬勃发展，院刊资料的首发优势在逐渐削弱，发行量逐年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办好刊物，对此我们做出了以下举措：第一，建立学术规范，在形势设计上最大限度的强化学术成果。第二，找准刊物定位，积极组织特色选题和栏目；第三，充分认识学术研究的交叉趋势。

《紫禁城》杂志执行主编朱传荣向与会代表介绍了《紫禁城》杂志的发展情况。《紫禁城》创刊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初期的商业赞助阶段，商业赞助停止阶段，目前作为院项目的支持阶段。长期以来，紫刊从开本、页数到刊期都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是秉承着博物院的历史，就是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学术，对待我们所服务的社会。这两年《紫禁城》杂志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今年又进行了新的改版，期望改版后的杂志能够为读者提供信、达、雅高水准的服务。信指资料性，即将故宫的收藏最大限度地公开发表，便于研究者深入使用资料；达，指的是把研究成果过程简洁化、直白化；雅，就是要展现我们的文化、文物之美和学术成果引人入胜之处。这三个标准就是我们杂志的追求。最后，她呼吁院里的专业人员和研究人员积极投稿，关注并参与《紫禁城》杂志的信达雅工程。

下午会议分上、下半场进行，上半场由施劲松先生主持，下半场由王小蒙、张露主持，围绕着有关文博考古与艺术类学术期刊建设问题发言讨论。

《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张自成先生作了题为《文博期刊的学术建设与电子传播》的发言。他首先对2008年全国文博期刊和研究论文作了资料统计，指出目前文博期刊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发行

量偏小，社会影响力偏小；第二，学术质量很令人关注；第三，文博期刊的同质化现象严重；第四，面对网络的冲击，普遍应对无术。然后，他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第一，针对文章质量的问题，学术期刊应该积极主动地根据专业发展提出自己的话题，再从策划引导学术潮流，为学术研究、学术创新提供舞台。期刊的管理者、编辑，应该成长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这样才可能出有深度有新意的东西。第二，关于同质化的问题，认为每个刊物应该根据自己编辑部的人员，根据所属地域，就某几个方面，打造几个特色板块，做深做厚，展示自己的个性，这样地域特色和板块特色就会凸显出来。第三，面对网络冲击，应该加强系统内的文博期刊合作，推出自己期刊的电子版、电子期刊，加强内容集成。最后他还对文物报社主办的几份报纸、杂志，它们的主要内容、版面设计及目前的发展现状作了简略的介绍。

《考古》杂志编辑部负责人杨晖先生作了题为《关注学科发展，加强考古资料报道的科学性》的发言。他结合自己在工作中的体会，指出在考古学的学术研究过程中，首先需要严格遵循田野考古操作规范，进行科学的挖掘，尽可能完整地获取古代遗存的信息，然后在此基础上，对资料进行系统科学的整理分析，进而编写出高质量的科学性较强的考古发掘报告。对于考古刊物来说，它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它的任务是如何通过考古成果来反映发掘水平、研究现状并促进学术发展。随着学科的发展，考古材料的记录和报道方式也在不断改进，我们在衡量一个考古资料报道是否具有科学性，在不同的情况下，着眼点也有所不同。他认为判断刊物发表的考古简报的科学性标准：应该是在有限的篇幅内最大限度地记录和报道考古资料，力求做到客观、准确、完整。作为学术刊物的编辑者，要做好考古资料的科学性报道，就要充分关注学科的发展，站在学术的前沿，充分发挥刊物的引导作用，与广大的考古学者共同努力，进一步做好考古资料的报道工作，为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作出贡献。另外他还就新时代新考古形势下，日常编辑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简报的撰写格式谈了自己的几点体会，与参会人员进行了沟通交流。

《文物》杂志副主编李缙云先生的发言题目是《组织发表文物考古资料稿件的几点体会》。他首先对《故宫博物院院刊》复刊30周年和《院刊》多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然后谈了自己编辑《文物》月刊的一些体会。他说注重对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报道。《文物》月刊多年来坚持这一办刊方针不变，并逐步形成了一些规律性的经验。比如对重要的文物考古发现，在发表发掘简报的同时会考虑组织一些相应的研究文章，并尽量安排在同期刊登，有时以约请专家笔谈的形式，这十分有利于读者对重要考古发现的认识和进一步研究。其次，《文物》杂志重视对某一地区的考古发现资料的集中报道。近年来《文物》月刊尝试在一期上对某个地区考古资料进行报道，向读者展示了这一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新发现，使这一地区的考古受到广大学者和公众的关注，受到好评。第三，杂志重视对某一类别文物考古发掘的报道和研究，特别是将某一类别在这个地区的新发现和研究展示在读者面前，以求最大限度地便于关注于某一专门领域的学者和爱好者。最后，《文物》月刊注重编排、印刷方面的改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近年来我们对《文物》月刊的栏目进行了调整，在封面版式上也

多次进行改进，期望以更好的形式对文物考古发现进行报道。我刊以上几点经验希望能提供大家参考，对文物期刊成果的报道有促进作用。

《江汉考古》唐珽女士代表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及《江汉考古》编辑部对《院刊》复刊30周年表示了祝贺，并作了题为《区域类文物考古期刊如何做好成果报道》的发言。她说，区域类文物考古期刊主要是指像《江汉考古》这样地域性较强的期刊。《江汉考古》自1980年创刊以来，定位是比较明确的，主要是面对长江、汉水流域，同时兼及我国南方地区。作为区域性期刊在报道考古成果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吸引发掘者在此类刊物上发表区域内的重要考古发现。我们尝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解决途径。首先，我们提高刊物自身的质量，在编辑、排版、印刷等方面多下功夫，保证考古发掘报告发表时文字少错，图版准确清晰。其次，对这些重要的考古发掘自开始起，我们就主动地和发掘者多联系多沟通主动地向他们约稿，尽量地把资料留下来，至少要发表一个简短的考古简讯，进行最快捷的报道以引起关注。对区域类考古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她认为应该从期刊的地域性和地方特色上入手，加强区域考古研究，设立针对本区域内有特色的考古研究栏目，逐渐形成期刊自己的重点和亮点。同时关注全国文物考古动态，增进与其他文物考古期刊的沟通和交流，适当的报道其他地区的考古成果。

《考古与文物》杂志副主编王小蒙谈了自己在工作中的体会，她认为，学术期刊编辑工作应依照“倡导学术创新，鼓励学术争鸣，追求学术规范”的原则。

首先，倡导学术创新是学术刊物应尽的责任。期刊对学术创新的倡导大体有三个途径：一是从编辑自然来稿中选择那些有新观点或新资料、新方法的优秀稿件，树立学术风范，引导学术风气。二是关注学术动态，追踪学术热点，主动走出去约稿、组稿，推介学术前沿的新发现，新成果。三是参与学术研究，从更高的、全局的角度主动策划，提出研究、组稿方向，引领学术潮流。这三个层次对学术引导的深度不同，对编辑的要求也不同。学术期刊应积极向专家办刊的方向努力，即鼓励编辑成长为某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和调动专家参与办刊，推进学术研究。

其次，学术争鸣是学术自由和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作为文博期刊的编辑，在工作中应有意识组织对同一问题不同见解的一组稿件，集中刊发；在坚持正确的导向的基础上，适当地快发、多发争鸣类的稿件；坚持学术自由的原则，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积极正面地鼓励新颖的方法和课题的诞生；审读稿件排除作者的职称等稿件外在因素的影响，体现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选择有引导地刊登书评，培养良好的学术风气。

第三，追求学术规范。所谓学术规范既包括学术道德的规范，也有技术层面的。她希望国内文博行业也能出版一部像美国《芝加哥手册——写作、编辑和出版指南》这样的文博学术论文规范手册，以此来指导编辑的工作。

《华夏考古》的辛革女士作了题为《关注和倡导学术中的“小”》的发言。她首先介绍了一篇经济管理类文章，文章作者总结日本能坚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原因是，日本人具有一种安心、凝视和

专注于细小事物中的那份“气”。以此为鉴，辛革提出作研究也应该安心凝神、脚踏实地，不求大，重视小，严谨考证每一个问题，做事究问每一个细节。作为学术期刊应该承担起规范、引导学术研究的使命。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我们可以以刊物为载体，为那些论据扎实、短小精悍、言之有据的文章大开绿灯，为倡导专注踏实的研究作出我们的姿态。安心于细小问题的研究，或是专注于一份具体的工作，小的就会成长，变得灵动，充满生机。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杂志副主编熊樱菲女士讲演的题目是《学术规范与期刊发展》。她首先介绍了上海博物馆主办的这本专业期刊的创刊、宗旨、内容以及刊物发展的相关情况，然后就学术规范和编辑规范在期刊发展中应起到的作用，提出办好学术期刊的几点想法。第一，健全刊物的制度规范。第二，建立合理公平的学术评价规范。第三，加强学术引证、注释的规范。第四，强化研究论文摘要的写作规范。总之，要办出一份高质量的学术刊物，需要编辑和编委、作者、读者的共同努力，需要严谨、科学的学术规范，需要编辑部不断学习取经、制订合理的编辑制度，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使期刊走上持久发展之路。

上半场会议结束后，与会代表就考古资料报道的科学性、简报数据的细化问题、学术规范化和编辑规范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雷闻先生以《唐研究》编辑的身份，对《唐研究》杂志的性质、创办和发展情况，刊物的主要版面、内容，刊物的资金支持、稿件来源、稿件审查制度，以及刊物在培养年轻研究力量方面的责任等相关情况作了细致地介绍。他立足史学领域的介绍，给与会文博期刊的编辑以积极启发。

下半场主题发言由王小蒙、张露主持，主要由各个博物馆的期刊代表发言，探讨博物馆期刊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国家博物馆《中国历史文物》执行主编李维明先生发言的题目是《浅谈文博学术期刊的学术性与社会性》。他肯定了《故宫博物院院刊》复刊30年来取得的成绩和在学术界的影响，然后就博物馆期刊的现状和前景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现在文博期刊的数量在增长，期刊的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不少期刊虽然正面临着作者群水准参差不齐、发行量不高以及网络化冲击等问题，但学术刊物不会消亡，因为它是精神文明和文博事业的发展所必需的，将来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办刊的力量和资源的重新整合问题。

他谈到文博期刊作为学术刊物，是文博学术交流的窗口，反映了单位的学术眼光、学术意识和学术水准。读者是对刊物学术水准的最好评价者，所以编辑要了解他们最关注的学术问题，认真用心地作好学术刊物的内容。关于刊物如何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的问题，他谈到了三点体会：第一，刊物要接触社会，与同行交流，资源共享。第二，刊物内容应是比较宽泛的，要兼顾作者群和读者面，以免因为过于狭窄的限制而影响刊物的发展。第三，学术刊物要为知识普及作出贡献，简单的讲就是要雅俗共赏。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文博误区，文博期刊应给予正确的引导，为繁荣历史文化和建设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河南博物院《中原文物》副主编张得水先生发言的题目是《文博学术期刊在博物馆建设中所担当的

责任》。他指出，自中国的博物馆初创之日起，科学研究就是博物馆的重要功能之一，文博期刊就在博物馆研究、文博事业发展中担当着重要的责任，它是学术的园地、博物馆学术品位的象征、培养专业人员的基地、引领博物馆发展方向的理论先导，其使命是服务社会、为读者普及文物和博物馆知识。

博物馆的免费开放，为我国博物馆的发展带来种种机遇和挑战，同时也为博物馆刊物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一是博物馆研究对象的多元化，二是博物馆的研究更加开放，三是研究成果转化的需求更加迫切。博物馆馆刊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博物馆本身的发展中，都应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博物馆内涵的丰富性，博物馆科研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刊物的质量和品位。

《历史档案》杂志副主编王道瑞先生发言题目是《〈历史档案〉创刊沿革概说》。他详细地介绍了《历史档案》的创刊过程和历史沿革，刊物的主要内容、版面设计，刊物的发行和网络传播情况。并对如何办好刊物，坚持自己的特色提出了思考：《历史档案》改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期刊在形成一定的风格后就不要再轻易地去改变，一定要坚持，这也是办好自己刊物的一个特点。

《上海博物馆集刊》的责任编辑陈凌女士发言的题目是《期待新形势下文博学术期刊资源的重新整合》。她向参会代表介绍了上海博物馆馆办刊物《上海博物馆集刊》的刊物性质——“以书代刊”，不定期出版；刊物内容特色——主要是原始资料的最初揭露和研究人员最初的研究思考；及其“以书代刊”类的刊物因为发行渠道和流通范围受限而带来的不良学术后果。她对新时代如何发展文博期刊提出了几点建议：一、开设文博学术期刊数字库。这样既可以整合已有的文博学术期刊网络资源，又可以扩大涵盖面，使整个文博学术期刊形成一股合力。二、博物馆期刊要放开胸怀，打破用稿、审稿的人为设限，这样文博学术研究才可能活跃和健康发展。三、加强馆刊编辑的业务交流和培训，提高馆刊编辑的业务能力，进而提高刊物的编校水平。

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网络栏目编辑负责人达微佳女士发言的题目是《我来给你一块敲门砖——谈故宫网站文化专题栏目的制作编辑》。她通过PPT的形式向大家展示了2009年改版后的故宫网站版面设置、栏目分类和主要内容。指出网站的主要工作是文化普及性的，面对的读者不是学术研究者，而是普通人，是文物和文化的爱好者，这就决定了我们对来稿的处理方式不同于学术期刊。网站编辑面对稿件要做的是：首先从论文中提取一个普及性的、读者感兴趣的主体，然后围绕主题挑选可以辅助说明的文物，再围绕主题分成几个知识点加以说明。这过程中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文字说明，可以图表说明，可以是动漫说明，还可以是问答的形式，总之是由点及面、由浅及深，用主题串起文物、文化这些美丽的珍珠。我们网站编辑的任务就是把读者带到知识的面前给他一块敲门砖，让他发现其实门里的风景更精彩！

11月29日的发言由科研处副处长宋玲平主持，代表继续就文博期刊内容、期刊的前景和网络数据库的情况展开讨论。

《院刊》编辑部宋仁桃就《院刊》历史类栏目的发展作“关于《院刊》明清史编辑思想转变”的发言。她对《院刊》复刊30年以来所有明清历史类文章作了统计和分析，认为其特点有两个：一是“择其

善而固执之”。《院刊》自复刊以来，一直把利用故宫文物藏品和古代宫廷建筑的特色，深入研究明清史特别是明清宫廷历史作为重点。二是秉着与时俱进的精神，编辑部注重了解人文社会科学界甚至是自然科学界的学术动态，及时对明清史类研究方向进行调整，引导作者和刊物在史学的前沿阵地探索。在这两种思想的指导下，《院刊》明清史研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表现为：一是在研究领域上，《院刊》在关注明清宫廷史、政治史研究的同时，还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并将其研究纵深化。二是学术方法论的变化，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历史问题已成为《院刊》的发展趋势。三是加强了对学术规范化的要求，与学术界的交流日益密切。最后，她将《院刊》发表的历史类论文和专门的史学期刊作了比较，指出院刊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只要坚持了故宫特色、与时俱进，就会吸引更多的作者和读者！

清华大学电子杂志社副社长王鹏先生发言题目是《文博类期刊的网络出版》。他以知网为例，向大家介绍了文博类期刊通过网络出版和传播的情况，以及面向编辑部在编辑出版方面所提供的服务和如何运用编辑出版平台。知网数据库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概况。他以知网为例介绍了包括各种类型的学术文献的数据化情况、规模及其学术文献在知网网络出版的五种主要模式：汇编出版、知识库出版、关联出版、单刊出版、知识元出版。第二，文博类期刊的网络出版。详细介绍了知网收录的文博期刊的数据化情况和文博期刊的海外数据中心概况。第三，服务编辑出版的平台运用。主要介绍目前网络文献的平台如何和期刊的编辑出版结合，即如何做辅助来支撑期刊的工作。知网还专门为编辑部、学术机构和个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许多辅助性帮助，如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个性化数字图书馆、学术期刊出版评价分析系统、中国引文数据库、CNKI期刊采编平台等。

他还针对目前出版体制改革下数字出版情况，提出了建一个数字化出版超市的构想，目的使编辑部成为市场主体，通过这种方式使数字出版发展进入规范化。最后他呼吁广大编辑部和知网一道把出版体制改革过渡时期的工作做好，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中国文化遗产》杂志的张双敏女士简要介绍了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她说，《中国文化遗产》是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的一份杂志，目前刊物有许多亟待改进之处，一是如何解决刊物运营的资金困扰问题，二是关于文博期刊的定位和读者群的问题。《中国文化遗产》杂志定位倾向于普及性刊物，如何将专业性和普及性结合得更好，这也是我刊今后长期的任务。

《院刊》编委杨伯达先生在发言中回顾了自己的学术成长历程和《院刊》之间的渊源。他说，当前《院刊》所面对的现实是：故宫从事博物馆的保管、开放、业务管理等方面的人员队伍很强而研究力量不强，《院刊》里面有分量的文章不多，原因就在院内研究力量不够强的缘故，故宫博物院乃至文博界研究水平不足与系统内长期以来的工作人员的结构有关。因此要把《院刊》办好，解决稿件研究水平不足的问题，故宫应该在研究力量上加强，也可以从院外寻找研究力量和稿件！争取一年一篇名文！有了坚实的业务基础，雄厚的研究力量，《院刊》才会越办越好！

编委刘雨先生结合自己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故宫的工作体会和给《考古学报》、《故宫博物院院刊》审稿的经历，指出单位学术风气、研究力量有助于刊物风格的形成；刊物的导向性很强，甚至可

以说刊物都能培养一代的学术风气和学术人才。学术期刊编辑在工作中应“倡导学术创新，鼓励学术争鸣，追求学术规范”，严肃把握稿件，提高刊物的权威性和学术性。同时也要引导作者撰写文风活泼、形式多样的学术论文，形成刊物自己的风格特色。今后我们刊物的努力方向就是要积极引导作者往学术性与文风活泼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蔚然成风后则一定会对学术发展有利。

编委施安昌先生充满感情地回顾了自己在《院刊》创办人刘北汜前辈鼓励下在院刊发表论文、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经历，呼吁学术期刊编辑应该尽量给年轻作者机会，鼓励年轻人从事科学研究，培养年轻学术人才。他同时呼吁《院刊》应多登载一些文笔活泼与学术性结合得好的文章，引导学风发展方向。

最后，李文儒副院长作了大会总结发言。他说，代表们这两天的发言，给了我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是关于期刊的学术文化使命。故宫刊物创办的历史大背景，说明刊物在学术文化社团、流派的形成和促进学术文化繁荣上所起到的作用和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第二个启示是学术方面的启示，提出了怎样继承故宫早期刊物的学术根底的思考。

李院长谈到这次大会上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三个问题尤其需要我们思考。第一个问题是文博事业与文博刊物的关系。怎样定位文博期刊的位置？怎样通过学术期刊导引文博界的学术风气、培养多类型的学术人才？博物馆和期刊如何处理好开放性问题、学术与社会、公众关系问题？刊物需要思考和做得是如何提供平台来引导这些研究。第二个问题是学术规范化的问题。如何从道德层面和技术层面来建立学术规范化？刊物和编辑可以通过发表学术性和文风结合的好的文章来引导学术恢复五四以来的学术风貌、学术文风、学者与刊物的关系，建立发展创新中的学术规范，为学术发展创新贡献力量！第三个问题是刊物与编辑的职责。刊物水平高低与研究队伍的素质有关，刊物和编辑在培养研究人才，引导学术风气良性发展方面责任重大。

另外他还提出期刊同行们应深入思考：在出版体制改革和网络冲击下刊物如何发展的问题？如何处理博物馆开放研究，博物馆与社会、公众的关系问题？建议期刊编辑结合刊物的实际情况不断探索，加强交流研讨，互通信息，联合起来发挥文博期刊的优势。

[会议整理者单位：本刊编辑部]

(责任编辑：张 露)